

憶杜秉祺

杜秉祺去了！畢竟與癌病戰鬥了這許多年！許多人也許沒有跟杜秉祺見過面，甚至不認識他。但今天四十來歲一直到十幾歲的人，假如在中學念過物理，很有機會就會經用過 P.K.Tao 的課本。P.K.也是我們對杜秉祺的暱稱。

杜秉祺雖則與我同年，對我來說，卻永遠是我的老師。七十年代，我在中學當校長，也教物理。學校裏面的物理儀器，泰半是香港數理教育學會的低價產品。我在本欄（本年二月七日）提過，當時的數理學會，不止帶領著理科課程的改革，而且爲了配合改革，大面積地爲教師組織培訓，大規模地製造低價儀器。當時的儀器，相當大部分是麥思源和陳尹玲夫婦在鴨寮街等地方搜羅廉價原料加工自製而成的。還記得，數理教育學會每年總有一、兩次低價儀器大售賣，發放的時候，在黃棣珊紀念中學大禮堂裏，人山人海，毫不熱鬧。可以靠民間的力量覆蓋幾乎是全港的儀器，而且是教學上屬於尖端的儀器，近乎奇蹟，因此在國際上頗有名氣。當時數理學會的主席，就是杜秉祺。我們對他崇拜不已。當時他是拔萃男校的物理教師。我到過他在拔萃的家，他是學生宿舍的舍監。當時就想，在校內是一位平凡的教師，他的影響卻可以超出學校，影響全香港。

信步華洋文化之間

當時印象中的杜秉祺，老成持重，說話不多，但是自有一種潛在的威嚴，大家都非常尊重他。他似乎有一種與生俱來的組織能力，把許多在各個科目裏獨當一面的事物，有效地、平和地組織在數理教育學會的旗下。

人們敬重他，當然最主要還是因爲他的物理教學非常出色，對於學生學習的過程研究得很通透；他有許多辦法把原來比較困難的東西，用巧妙的實驗，深入淺出地讓大多數學生都能夠很快掌握。而且他不是在一兩個課題上教得好，而是有系統地完整地研究中學物理的條理與連貫。

人們敬重他，也是因爲他的人緣非常好。他待人和善，從來很少看到他會表現出對別人的不滿，更從來不會提高聲調責備別人。但是他又絕不「和稀泥」，凡事很講原則：不隨便、不馬虎。他身上既有中國傳統的儒士風格，又有英國式的紳士風度。而且有一個特點，能夠在華洋文化之間信步自如。

然而，就是這樣的一位儒雅的教師，帶動香港科學教育的千軍萬馬。在當時來說，香港的科學教育，遠遠超出亞洲的水平，走在世界的前列，在世界科學教育的

群體中頗有地位。杜秉祺應記一大功。杜秉祺因而在國際上也廣為知名。土生土長的教師，卻能夠馳騁國際。

當年的數理教育學會，可以說是教師專業學會的表表者。一方面在課程教學層面的專業發展完全是世界前列，另一方面又從科學教育的專業角度積極參與教育政策的討論。當年我念碩士的時候，把香港接近一百七十個教育團體，分為四大類：以教師權益為焦點的教師職工會、以學校利益為焦點的學校議會、以教育方針政策為焦點的輿論團體、以及以教育專業為焦點的專業學會。數理教育學會是當時最突出最活躍的專業學會。在數理教育學會的章程中，開宗明義說明數理教育學會不參與經濟權益與政治權力為目的活動。不是說不關心權益與權力，但是教育團體之間有自然的分工，有了申明，就可以在種種權益與權力的紛爭之中，排除紛擾，即使亂世，仍然可以為教學專業不斷創造空間，讓專業的發展不致停頓，讓學生能夠連續不斷地享受不斷提高的教學環境。而這，正是專業的最高責任。

七十年代末，我結束了自己的學校（培元），到聖保羅男校當物理教師，參加過許多由杜秉祺主持指導的研討會、培訓班，更加感到他那種大刀闊斧改革，但是認真細緻實踐的風範。他在拔萃，有一個令任何物理教師垂涎的實驗室，但是實驗室裏面的操作，只要可能，他決不隨便假手他人，絕不胡亂指使技術員。一九八〇年，我開始加入香港數理教育學會理事會，在杜秉祺的旗下當了兩年義務秘書。他是要求頗高的一位主席，但是和他工作又非常愉快，從來沒有發生過磨擦的事情。一九八二年，杜秉祺主動請退，我接任當了一年主席。之後，我到英國念書，之後又不再教物理，一段時間與他聯絡不多。只知道，他到了中文大學教書，又輾轉到港大任教，後來到了澳洲兩年，不久又回到港大，專門負責科學教育。直到最近才再見了幾面。

研究寫作出版不斷

這期間，杜秉祺編的物理課本，已經成為最暢銷的物理課本。有書商告訴我，他的課本，佔市場接近百分之八十。這是很不容易的事。也在這期間，杜秉祺同時在澳洲蒙納殊大學跟隨名師拿到了博士學位。只知道，他在物理教學方面又更上一層樓，一方面創造了許多與物理直接相關的運用資訊科技的教學法，另一方面又把物理與日常生活直接聯繫起來。他的影響，已經超出香港，即使在內地、在台灣，在物理教育方面，也不難看到杜秉祺的影迹。

杜秉祺在二〇〇年得病，二〇〇二年因病轉任榮譽教職。這期間，研究、寫作、出版，從未間斷，直到體力不支的最後一刻！

杜秉祺的名字，將深深地刻在香港教育史碑上！